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对策建议

郭建宏

摘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高风险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总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资金规模大、风险高发行业相对固定和区域集中度高等特征。从风险类型看，东道国政治风险、恐怖袭击、保护主义和社会文化风险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为保障对外直接投资利益，中国应着力构建系统化的风险防控体系。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特征；风险类型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 (2017) 01-0075-10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开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居于中国投资领域的主要位置，尽管也有一些企业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经营，但由于规模不大，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单向流入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04年以来，随着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扩大到2015年的1,456.7亿美元，增加了50多倍。2012~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三位，2015年更进一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而且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势头在2016年仍将延续。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累计实现投资400.9亿美元，同比增长55.4%。目前，中国的直接投资基本形成双向流动的格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和输入“双料”大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随着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崛起势头令人瞩目。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和遭受的巨大损失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10多年来，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特别是一些重大投资项目的失败，如2009年中国中铝报价195亿美元收购力拓部分股权的并购交易失败、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约200亿美元的投资因为利比亚内战而遭受损失等等，更是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

作者简介：郭建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保护投资利益,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迫切任务。

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同样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围绕风险状况和对策措施开展了不少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从企业和项目层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类型,进而提出风险防范措施。有的研究按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对的风险类型,通过模型估算不同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评估对外投资风险(刘旭友和颜晓晖,2008)。二是对某一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如对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制度和文化风险等特定风险类型进行分析,提出风险的量化评估方法(孟凡臣和蒋帆,2014)。三是聚焦特定地区或特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例如,有的研究关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钟春平和潘黎,2015),有的则聚焦能源、金属等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状况(翟玉胜,2015),针对直接投资风险问题对今后的相关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的理论分析及防范,缺少对中国对外投资风险宏观特征的总结研究,因而对国家整体对外投资风险的判断仍是基于总体印象。本文尝试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特征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类型和来源,进而提出防控风险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风险特征

很多文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状况的总体判断大多基于对投资失败的频度和金额的主观印象,但由于缺少统计数据的支撑,无法得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更为客观的特征分析。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器(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tor, CGIT)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为我们提供更为直观的基础数据。尽管其统计口径与商务部有所差别,但巧合的是,两者的统计结果却基本相同(Scissors, 2012)。从近10年来CG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易的追踪数据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发生次数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的频率高。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报道屡见不鲜,中国海外投资危机频发、总体成功率不高的形象几乎已成为普遍共识。有专家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①根据CGIT的统计,2006~2014年中国上亿美元规模的对外投资共694起,其中的问题投资(所谓问题投资是指签署投资协议后,因各种风险而无法正常进行的交易)共发生144起,平均每年近16起,问题投资发生率达到21%。从时间趋势看,问题投资的数量逐步增多,2011年是高发期,规模过亿的问题交易发生23起,当年问题交易发生率高达

^① 新华网·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亏损.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2/09/c_127473411.htm.

50%。之后，这一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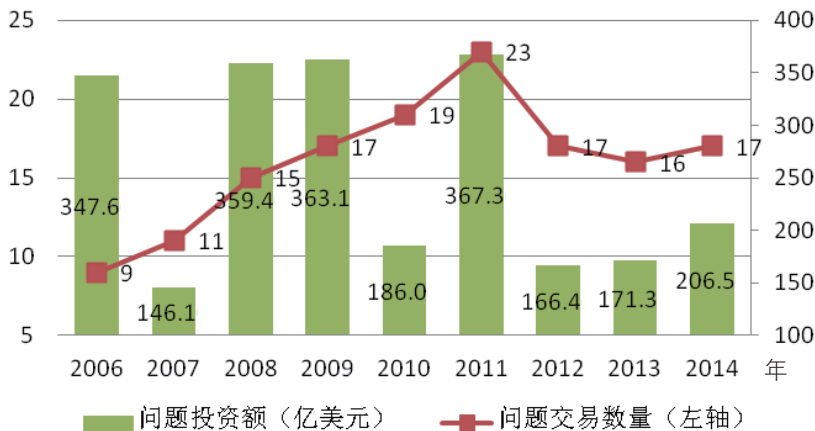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外投资问题交易数量及问题投资金额（2006~2014年）

数据来源：根据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tor 数据计算。

第二，从资金规模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涉及的投资规模大。通过问题投资的总额和项目平均规模可以充分描述这一特征。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生风险的投资总额巨大。在2006~2014年期间，有4年中国对外投资中发生风险的投资金额高达350亿美元（见图1），相当于2014年全球第12大对外投资国——法国的对外投资额。这9年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问题投资额累计2,313.7亿美元，占期间对外投资总额的41%。其次，发生风险的单项交易规模庞大。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每年发生风险的问题投资平均规模都超过10亿美元（2010年和2012年问题项目平均规模为9.8亿美元），2006年问题投资的平均规模最高，超过了38亿美元。中国铝业2009年以195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股权失败，更是创下近些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规模的最高纪录。

第三，从行业分布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高发行业相对固定。从总体情况看，能源和金属矿业是近10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高发行业。根据CGIT的数据计算，2006~2014年，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发生风险的资金规模累计达到709亿美元，占全部问题投资额的31%；金属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生风险的资金累计达到689亿美元，占全部问题投资额的30%。从年度情况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的行业高度集中，每年80%以上的投资风险发生在3个行业。其中，能源和金属矿业是对外投资风险高发行业，除个别年份外，这两个行业一直位列中国对外投资风险行业排名的前三位。如图2所示，2006年交通运输业问题投资占比为21.8%，取代金属矿业成为排名第二的投资高风险行业；2007年农业的问题投资占比为37.2%，仅次于能源业，居于第二位；2008年金融业投资失败占比为65.2%，成为问题投资金额最大的行业；2010年技术投资失败占比为36.5%，超过能源业，排名第二；2011年不动产投资失败占比为23.6%，超过金属矿业，排名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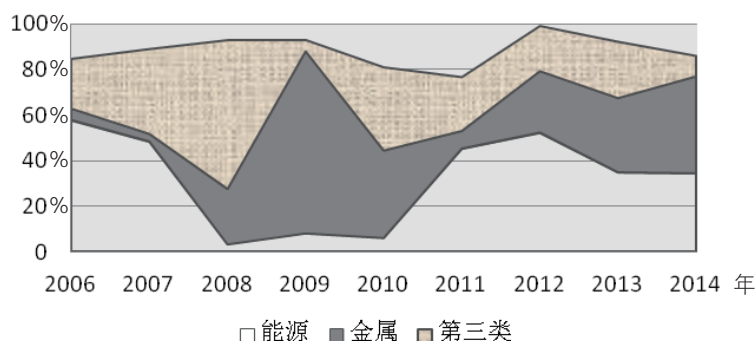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问题投资的行业分布（2006~2014年）

数据来源：根据CGIT数据整理计算。

第四，从地理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区域相对集中。从投资风险案例的发生次数来看，在2006~2014年期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对外直接投资爆发风险的次数最多，共22起；美国和欧洲紧随其后，中国在两地的直接投资分别有19起问题投资。从问题投资项目涉及的资金规模来看，在澳大利亚的问题投资项目涉及的资金规模最大，高达464.2亿美元，这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矿业有关；在西非地区次之，问题投资规模为371.2亿美元；欧洲和次撒哈拉非洲分列第三和第四，问题投资规模分别为340.7亿美元和308.5亿美元。从年度数据来看，澳大利亚、美国、次撒哈拉非洲和西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发生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与统计期间内的投资风险区域分布总体一致。

三、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开展的跨国跨地区的投资经营，需要面对不同于母国的商业环境，企业将比在国内投资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投资风险。实业界和学术界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按照不同的应用目的和分类标准把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不同类型。加拿大银行家纳吉根据国别、投资主体、触发因素、资金用途、风险发生的原因和严重程度等6类标准将对外投资风险进行分类，有的研究则将多种风险因素综合起来统称为国家风险。大多数研究则按照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加以分类。

为更全面、更清晰地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可以综合上述不同的投资风险分类方法，采用投资风险矩阵来描述投资风险的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矩阵的行表示风险的影响层面，依照影响范围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国际风险、国家风险、行业风险等不同层次；矩阵的列表示风险的来源分类，依照风险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等。根据研究的需要，风险的划分可以进行细分或者整合。

表 1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矩阵

风险来源 影响层面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
国际风险	外交关系、恐怖主义等国际政治格局变动	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国际经济规则调整等	各国社会习惯和文化风俗差异引发的国际冲突
国家风险	政权更替、政治冲突、国家征收等	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	由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差异产生的国内矛盾
行业风险	对行业的政治干预	行业的周期性因素或影响范围局限于某些行业的经济因素	因为社会文化差异，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对某一行业的认知差异

（一）国际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风险是指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风险。当前，全球一体化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世界各国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甚至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巨额损失。国际风险主要包括 3 方面内容：一是国际规则变化风险。进入 21 世纪以来，WTO 的影响力逐渐衰减，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全球经济被各种区域性协定分割为一系列重叠交叉的经济集团，每个经济集团的规则不尽相同。颇具影响的 TPP、TTIP 都在制定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规则，谋求重塑全球经济规则的领导权。国际规则变化将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制度环境。二是全球经济动荡风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经济体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一些重大经济事件的扩散范围和影响程度显著增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全球经济至今仍未从危机中复苏。在经济形势低迷的压力下，各国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三是国际政治风险。进入 21 世纪，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国际政治格局正在重构。国际恐怖主义对全球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大国干涉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诸如此类的国际因素产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单一国家范围，而是更为广泛地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二）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国家风险包含的内容也逐渐丰富。一般来说，国家风险主要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宏观国家风险。依据不同的风险来源，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国家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

国家政治风险是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东道国政府的政治、法律和政策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财产及其权益的损害或损失。从其作用范围和表现形式来看，国家政治风险包括东道国对外关系变化、政治制度或政权更迭、内战或动乱、国内民族矛盾激化、治安恶化以及出于保护主义等原因采取的政府干预措施。政治冲突和政局动荡等政治风险往往会造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无法经营或

者既有资产被完全侵占的情形，其造成的损失远甚于市场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风险是指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给跨国投资造成经营不利，带来利润乃至资产损失。每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运行都有其内在周期，在扩张和衰退之间循环往复。同时，各种外部冲击也会给经济体的运行造成波动。宏观经济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活动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从经济指标来看，通常表现为东道国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就业形势恶化、国际收支失衡、汇率和利率水平的波动等等。

社会文化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面对的第三类国家风险因素。社会文化是由特定人群在历史发展中创造并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响的各种社会规范和文化活动的总称。它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众多内容，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独特的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当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时，往往使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更多风险。

（三）行业风险

行业风险是指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对某行业生产、经营和投资偏离预期结果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行业周期、技术变革和政策变化等是引发行业风险的主要因素。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关注国际风险和国家风险外，同样需要研究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于国际化程度较高或者政治敏感性强的行业，在作出投资决策时更应充分论证，以保证投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

虽然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毕竟发展时间较短，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投资风险的预防和抵御能力相对不足。CGIT统计的2006年至2015年上半年中国问题投资共153项，笔者据此查找相关材料，其中102项有关于交易风险的报道和研究，其余交易未找到相关资料。在102项投资风险中，外部投资风险主要有4种，其中18项属于东道国政治动荡，14项属于保护主义，7项属于恐怖袭击，6项属于社会文化因素，其他风险主要是商业风险和政府审查问题。

第一，东道国政治动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分布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这些地区民族矛盾突出、政治局势混乱，很多国家经常发生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使跨国投资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例如，2011年利比亚爆发内战，反对派通过武装进攻推翻卡扎菲政权。受内战影响，中国各大公司在利比亚总部及各项工程基础设施、设备和材料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国家动用陆海空交通工具将所有在利比亚人员接回国内安置，专家估计相关损失超过200亿美

① 马宁. 利比亚动荡，中国企业利益损失几何？[N]. 北京青年报，2011-03-25.

元。^①

第二，恐怖主义袭击。由于意识形态、民族矛盾和宗教等因素，国际社会某些极端组织或个人不断制造恐怖事件，试图达到经济或政治目标。中资企业遭遇的恐怖袭击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因为种族、历史和政治原因是恐怖活动的多发地。2009年11月1日，紫金矿业集团在秘鲁北部的奥兰布科铜矿遭遇武装人员袭击，3名当地雇员死亡，矿场设施被焚。2012年，在苏丹、埃及等地发生多起绑架、劫持中国工人事件。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2015年，共发生涉及中国企业机构的各类境外安全事件345起，^①恐怖袭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大威胁。

第三，保护主义因素。保护主义一直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巨大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全球主要趋势，但与此同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却时有抬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保护主义再次在全球泛滥，并呈现出新的形式。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资源获取型和技术寻求型为主，而资源行业通常是东道国要保护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则因为东道国为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而限制外资介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资源掠夺论”、“技术窃取论”等更成为限制中国投资的借口。例如，曾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铝业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败，华为公司在美国收购3COM、2Wire、Sprint等公司相继受阻，保护主义作祟是重要原因。

第四，社会文化风险。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时，一般仍采取国内拓展市场的模式，高度依赖各国政府和精英阶层，走“上层路线”。在非洲、亚洲及拉美一些国家，中国企业抓住机遇与东道国政府展开了深入合作，迅速打开局面，进入当地市场。但是，有些企业却忽视了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不重视与基层民众的公共关系，未能与当地社会很好地融合，从而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埋下隐患，最终酿成生命财产损失。例如，在2012年，赞比亚的一个中资煤矿因劳资纠纷爆发冲突，导致中方的一个经理被杀害，中方与当地员工在社会价值和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防控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对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商务部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5~10年有望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此，全面提升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复杂性，从国家

^① 新华网.2010年至今共发生涉中企机构境外安全事件345起.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5-12/02/c_128491245.htm.

层面而言,预防和应对风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任何局部性措施都难以取得良好效果。中国应着力制定系统性投资风险控制解决方案,调动国家、社会、行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多层次投资风险控制体系。

(一) 加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建设,为对外直接投资权益提供法律规范

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现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主要是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一些地方出台的地方性法规。虽然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法规不断完善,但是各种法规之间缺乏统筹规划,系统性和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既不利于法律实施和权益保护,也不利于企业遵循和把握。中国应尽快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优化整合现有的部门法规,建立既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又能保护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法律体系,为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供法律规范。

(二) 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为对外直接投资争取国际制度保障

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拓展的趋势下,国际规则对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日渐加强。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在国际投资规则重构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形势的客观要求。一是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投资协定的制定。当前,WTO的投资协议已经不能满足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美国极力推动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试图提出更高标准的投资规则,一旦达成协议,将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应继续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规则,利用现有规则维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益,同时积极推进WTO协议升级。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深化,主动构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网络。二是要高度重视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签署与升级。BIT是应对政治动荡的重要国际法依据,大多数BIT都规定了东道国政府在发生政治动荡情形下应当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责任。中国已经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投资协定,^①但绝大多数签订于20世纪90年代,大多都没有规定“完全保护和安全”条款。中国应尽快修订、升级这些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同时与尚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开展谈判。

(三)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应对保护主义阻挠

分析缘于保护主义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可以发现,这些案例一般都具

^① 中国经济网·商务部:中国已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投资协定。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603/17/t20160317_9571808.shtml。

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投资行业较为敏感，如石油和矿业大多属于东道国的经济支柱，高科技产业则具有保持东道国竞争力的技术优势；二是投资规模较大或此前已有一定规模的国内投资，容易引起关注，形成话题效应；三是投资的国有企业背景，指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承担着国家政治任务是西方国家经常使用的借口。有鉴于此，一方面，中国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阐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减少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和歪曲；另一方面，中国应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规范政府行为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和相应的责任，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具体投资项目的决策管理，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运用灵活的对外投资策略，通过分批增持、联合投资和间接持股等方式减少保护主义的干扰。

（四）发展国际安保服务产业，保护对外直接投资的人员和资产安全

跨国公司聘请安保公司保护公司的人员和资产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和国有银行等，自2006年起就开始雇佣国际安保公司提供安全服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安保服务仍有所欠缺。一方面，很多企业的安保意识不强，认为没有必要投入资金应对小概率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海外安保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海外安保服务基本上由跨国安保巨头垄断，中国海外投资企业购买安保服务不得不接受其昂贵的垄断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安保形成了制约。由于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安保需求仍有很大缺口，海外安保产业颇有发展空间。中国应在《蒙特勒文件》和《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行为守则》两个文件为核心确立的国际安保产业规范下，进一步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以市场导向为基础、以科学监管为前提的国内安保产业政策体系，引导和规范中国海外安保产业的发展，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安全保障。

（五）实行本地化经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化解社会文化风险

对企业跨国投资经营而言，化解社会文化风险是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实行本地化经营。本地化主要是尊重当地社会文化习俗和法律制度，雇用、吸收优质的本地人才加入企业管理队伍，在企业经营中与本地厂商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这有利于减少社会文化摩擦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应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扩大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推动和谐发展。

（六）建立信息发布和研究机制，为风险防范提供信息和研究支持

及时准确的风险信息发布和对策研究是防控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前提。要加强大使馆、媒体记者站等驻外机构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国情信息的发现和搜集能力建设，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机制，建设资讯综合发布平台，加强

不同来源信息的共享互联,及时为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大众提供信息。引导和支持国家智库、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积极开展国际问题研究,形成国际和国别研究网络。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既要研究全球国际风险和东道国政治形势,关注东道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政党格局和政治态势,也要研究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社会变迁、宗教文化和法律政策,注重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研究,提升国际形势分析和预测能力,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提供研究支持。

参考文献:

- [1] Scissors, Derek. Global Patterns in China's FDI.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Capital Market. http://uschinacenter.as.nyu.edu/docs/IO/27891/Scissors_paper.pdf. 2012.
- [2] 陈蔚.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防范[J]. 当代经济, 2005, (1).
- [3] 刘旭友, 颜晓晖. 基于模糊层次(F-AHP)分析法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综合评价[J]. 社会科学家, 2008, (12).
- [4] 孟凡臣, 蒋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J]. 国际商务研究, 2014, (9).
- [5] 翟玉胜. 中国能源海外投资风险实证研究——以南苏丹石油投资为例[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5, (4).
- [6] 张雨, 戴翔. 政治风险影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吗[J]. 国际经贸探索, 2013, (5).
- [7] 钟春平, 潘黎.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一带一路战略[J]. 开放导报, 2015, (4).

The Risk of China's Outward FDI and Countermeasures

GUO Jian-hong

Abstract: The high risk of China Outward FDI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t demonstrates four features as a whole, which are high frequency of risk, large amount of investment, high leve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and 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main types of risk are political risk in the host country, terrorist attack, protectionism, social and cultural risk. China should construct systematic risk-defense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 benefit of outward FDI.

Key words: China; outward FDI; risk features; types of risk

(责任编辑: 张建华)